

〔美〕马克·A·施托勒 著

ALLIES

盟友

和

AND

对手

——解读美国大战略



新华出版社

盟友和对手

——解读美国大战略

马克·A·施托勒 著

王振西 主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盟友和对手: 解读美国大战略/ (美) 施托勒著 (Mark. A. Stoler); 王振西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12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书名原文: Allies and Adversaries

ISBN 7-5011-5469-4

I. 盟… II. ①施…②王… III. 外交政策-研究-美国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733 号

京权图字 01-2001-4545

Allies and Adversaries

Copyright (c)2000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The Chinese edition has bee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2001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盟友和对手

——解读美国大战略

[美] 马克·A·施托勒 著

王振西 主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82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469-4/D·883 定价: 22.00 元
(提请读者注意: 本书正版封底均贴有防伪标志)

译者：王振西 张兰琴 高俊玲
吴静静 杨润秀 严伟江
李 英 何鹏程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海、空三军穿军装的领导者们，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史无前例地担当了关键角色。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旋即宣告成立，其成员的正式职责是负责国家军队的组织编制及把握军队的战略方向。然而，在战争进行期间，其职能范围逐渐扩展到了许多对外政策问题上。当时，军方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举足轻重，恐怕唯有总统方能对最后决策弹压一二。

这种扩展给美国文官与军方的关系带来了戏剧性的持久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军方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少之又少。可是，战后仅两年时间，随着 1947 年国家安全法的通过，武装部队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扩大的职能作用便已合法确立。国家安全法案不仅使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个战争年代的临时性组织摇身一变成了新设立的国家军事机构，而且使它成了对外政策制定方面一个势头强劲的常任角色。“对外政策”这个术语实际上已为“国家安全政策”这个意义更为宽泛而又具有军事意味的术语所代替这一点，即是这一变化的例证。

战争期间，军方关于美国安全需求的定义同样发生了变化。1939 年之前，安全需求所涉及的范围极为有限，只是集中于美国本土、海外属地及西半球。然而，1945 年以后，军方的计划

人员就将美国安全需求定义为全球性的，而且是密不可分的了。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件均被看作是对武装部队的威胁，因而也就成了它所关注的目标。对于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及武装部队在继后冷战中的作用，进行过分析的学者不胜枚举，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安全需求赖以扩大的具体战时过程，或者说美国武装部队赖以在政策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具体战时过程。在本书中，我不仅将涉及战争期间这些过程与美国军事战略形成的关系，而且对这两个方面均将进行探讨。

战时军方在对外政策方面影响力的上升，是由多种特定的因素和环境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对全球性总体战的全面参与。时任陆军总参谋长的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战争中指出，“总体战中任何一项行动都具有军事意义。”因此，在制订与实施获胜战略的过程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计划人员不得不考虑多不胜数的对外政策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既是一场全球性与总体性的冲突，又是一种联合战。这一点意味着美国的战略不能在外交真空中制订。恰恰相反，由于美国、英国和苏联结成了同盟，加之美国又保证向这两个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并与其协调全球战略，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计划人员不得不与其战时盟友建立既广泛又深入的关系，而且还得对他们与美国的战略与政策相关的战时及战后战略和政策进行详细评估。

国务院在战争期间影响力的急剧下降，更使得军方在外交问题上的作用急剧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下降是战时优先考虑事项不同的必然结果。然而，国务院内部的严重不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人为地将军事与政治事务分离开来的做法，同样加剧了它自身影响力的下降。赫尔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不同，他将战争与外交看成是相互分离而不是相互补充的活动。因此，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认为国务院的主要职能应当是从外交上对

军事努力进行协助，同时对战后年代做出安排。可是，国务院的人却发现，即便是在这后一点上，武装部队以战后政策与战后军事安全事务无法分离为由，仍在要求扮演、实际上也确实扮演着主要角色。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为国务院战时在对外政策方面影响力的下降和军方影响力的上升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包括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对国务院的信任程度较低，他决意要形成并实施自己的一套对外政策，以及执意要成为一位异常活跃、与自己属下的武装部队直接发生联系的总司令。早在1939年，他就成功地绕过陆海军的文职部长和国务卿，命令各军种参谋长直接向他报告。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坚持这种作法，并允许他们直接与白宫联系。他对军方这些人高度器重的作用力同样不可小视，这种器重主要是因为具有沉着冷静的职业作风，但这种尊重之所以能够得以巩固，恐怕还得益于这些人明显缺乏政治野心的缘故。由于以上原因，当时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之外，与罗斯福比较接近并能对他有所影响的就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了。此外无人能望其项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陪总统前去参加战时所有的最高级会议，定期向他提供建议，为他准备会议材料，甚至还帮他起草给同盟国领导人的电报稿。1944年，他们甚至取代日见衰老的霍普金斯，成了他的主要顾问。

长期以来，人们传统上一直以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既不渴望、也不准备接受在对外事务领域中这种新的权利。美国人信念中那种武装部队应服从文官统治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想必他们会坚持军人确定军事手段、政治领导人决定政策目标的原则。因此，他们的想法和建议会议限于“纯军事”方面，从而有助于在向总统提出详细政治建议方面建立真空。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及其计划人员的头脑决非如此简单。他们清楚地懂得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工具那句名

言，懂得因此而需要军政双方进行详尽的合作和对美国战争努力的各个方面做出政治判断。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多年，他们就一直在要求进行这种合作，并且在自行进行政治评估，用以辅助其战略计划的制订。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样做。他们在战争时期的影响力大大增加之后，这种要求和评估自然也就随之加重了分量。

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及其计划人员还意识到，战争给他们提供了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机会，他们终于可以跟制定政策的文官合作了，可以将他们对美国安全需求的看法传达给这些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戏剧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地缘政治现实和军事现实，军方战前那种安全需求观念因之也需要有大幅度的改变。此外，如同文官在这些问题上受到军方观点的影响一样，军方计划人员在战争期间也同样受到了文官一些思想概念的影响。

鉴于此，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包括许多相互关联的政治与军事问题，其中主要包括：武装部队如何以及为何要拓展国家安全的定义并且在政策形成过程中获取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战争期间美国战略的演化、战略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战争期间文官与军事领导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军种与军种间的关系、以及美国的战略与政策与主要盟国的战略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后一个问题对武装部队来说尤为重要，也是我探讨的中心问题，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首次承认自己的安全与盟国的安全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可是，对轴心国的全面胜利一旦成为现实，这些盟国便会成为战后的潜在对手。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计划人员完全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对战争期间与战后时代实行何种战略与政策为合适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支持这些盟国与促进战后合作的需要上，同时也十分注意一旦合作不能达成需如何保护美国不受他们侵害的问题。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对美国战略与政策的关注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军方

对英国和苏联的战略与政策的关注史，因为这两家均被视为当时的盟友和潜在的对手。

本书中所用的不少概念和词汇定义颇多，有些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我不揣冒昧，选用了自认为最合适的定义。但是，由于读者了解和使用的定义可能有所不同，在此我想明确几则，以避免引起读者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武装部队”或“军方”一词虽然在我所研究的那个时间段里仅用于指陆军，但在本书中指的却是海军和陆军这两个军种。同样，尽管武装部队认为“对外政策”只是实现“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但这两者在本书中却是互相换用的。“俄国”、“俄罗斯”和“苏联”三词一样也是互相换用的。

本书原本仅打算涉及欧洲部分的战争，时间限定在珍珠港事件到罗斯福逝世和德国投降这个时间段。可是，我在这些年的研究与分析过程中发现，各军种参谋长及其计划人员在战略、外交、安全以及文官与军方关系上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与1941年12月7日以前所发生的事件有关，而且他们的看法在1945年4、5月份以后还在继续演变。这就使原计划非常简短的开头和结尾章节大大拉长，最后形成了目前这种结构与覆盖范围。目前构成本书的十三章分属四个相互重叠而又有明显区别的时间段，各章均有各自的主题。第一章至第三章集中探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珍珠港事件这段时间内军种之间以及文官与军方之间发生的冲突，同时也论述了该时间段内美国的战略与军事思想在对外政策及联盟方面的变化情况。第四章至第七章分析了1942年和1943年期间的战略大论战，以及军方对英国和苏联战略与政策的评估。第八章至第十章论述1944年至1945年初军方开始认真思考战时与战后问题时观点的变化与统一情况，这些变化对战后计划制订、与总统及国务院的关系、以及在战后国家安全问题上

出现的全球观念均有影响。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探讨了先前虽已出现但此时呈逐步升级趋势的军种内部、军种之间以及军方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争论，同时还论述了苏美冲突随着德国与日本先后投降而日益加剧，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观点和政策上发生的转变。

在过去几年中，许多原来为写作本书进行研究时用过的档案材料和手稿后来已编辑出版。但是，只要有恰当之处，我均尽可能将原文和发表后文本的出处都列出来。有些材料和手稿虽仍未发表，但自从我最初进行研究以来已经不在原处或已重新归档，本书引文部分亦将尽可能反映出这些变化。

致 谢

本书的完稿时间较之原来估计长了很多，实际上在十年前即该完成。假如人是一部永远累不垮的机器，而世事又非难料的话，本来应当如此的。然而，“假如”毕竟不是现实，现实中的酸辛这些年我已经领教过了。前言中所述研究范围的扩大，完成其它项目的需要与愿望，以及生活本身的不可逆料性，使得完稿时间一拖再拖。我只希望，时间的延长能为本书增添几分智慧的光芒，能够稍加补偿一二。当然，这同时也加长了应该答谢的个人与机构的名单。

佛蒙特大学给了我一年的假期，舍此我无法完成此书。该大学的研究与学术成就委员会、研究生院和文理学院为本书早期及后期的美国档案研究、在英国档案馆的研究和我多次出席全国与国际会议提供了资金。本书部分内容即是首先在这些会议上宣读的。宣读后有些后来便作为文章、书籍的章节和会议论文发表了，这些已在本书第四页上列出。我非常感谢能允许我将这些出版物修改后再用。对于佛蒙特大学给予我的资金方面的支持，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另外，我还要感谢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西利·G·马德手稿图书馆同意我引用爱德华·米德·厄尔和詹姆斯·V·福里斯特尔的文件，感谢允许我使用弗吉尼亚州列克星敦市乔治·C·马歇尔研究图书馆所藏乔治·C·马歇尔已发表和未发表过

的文件、保罗·M·罗比内特的日记及威廉·撒迪厄斯·塞克斯顿的文件，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图书馆所藏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的文件，属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斯坦福大学版权所有的胡佛学会档案馆内艾伯特·C·魏德迈的文件。

我虽然并不信奉过去二十年来盛行于世的那种非常个人化与自白式的写作模式，但我确实认为，本人经历中有一点甚为重要，它与本书以及应该领受谢意的人们有着直接的关系，那就是我从来没有在武装部队服过役。此外，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那一代人中的一员，我对武装部队在越南战争期间的活动及其申明的观点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实际上，我对研究战争时期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兴趣源于这么一个愿望，即找出我认为非但不正确而且极端危险的军方影响与看法的根源。然而，当时我对军方的思维方式全然不晓，对军人、对军事史都存有过于简单的程式化看法，所以深受其害。

首先给我那些程式化的看法带来冲击的是爱德华·M·科夫曼，这位军事史学家引导我看到了“新”军事史的诸多方面。与之同时的还有马歇尔的传记作者福雷斯特·C·波格以及外交史学家约翰·A·德诺沃和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威廉斯虽然以其对美国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左派”式的重新解释闻名于世，但却鲜有人知道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勋章加身的海军军官。在他看来，军队对国家构成的真正威胁是文官领导层思维方式的军事化，而不是武装部队对权利的觊觎。他还认为，军方领导人“当他认为自己除了削弱国家结构及违反国家原则的手段之外便无法保卫祖国时，他首要的特殊责任便是说不”。他自己曾如是说。这一看法得到了本项研究中所涉及到的许多军官们的赞同。

我那些程式化的看法进一步受到冲击是 1981 ~ 1982 在罗得岛新港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战略系当客座教授那个学年，以及

1994~1995 在纽约西点军事学院任客座历史教授那个学年。这两个学年的经历还使我具备了极其宝贵的学术眼光，尤其是在政治之于战略的目的与手段关系问题上。这一点在军事思想中极为重要，因而对本书也极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批可以与之讨论我的著作的杰出学者和军官，其中最主要的是新港的乔治·贝尔、马里诺·巴托洛梅、史蒂文·罗斯和罗伯·特伍德，西点军校的迈克尔·贝尔、查尔斯·布劳尔、康拉德·克兰、罗伯特·道蒂、科尔·金锡德、朱迪斯·勒基特和斯科特·惠勒。当然，实际上还远不止这几位。

历史学家都知道档案馆的重要性，它不仅能提供所要的档案，而且还能提供通过其它手段了解不到的有关这些档案的情况。遗憾的是，其他人对这一点并不都很了解。众多档案员在这方面给予我的协助对本书的完成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尤其是国家档案馆的威廉·坎利夫、蒂莫西·嫩宁格和约翰·泰勒多年来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建议。此外，我还承惠于海军历史中心的迪安·阿拉德、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的理查德·萨莫斯、美国军事学院图书馆的艾伦·艾莫尼和苏珊·林特尔曼、乔治·C·马歇尔研究图书馆的约翰·雅各布，以及缅因州坎登市公共图书馆的多萝西·莫拉莱斯。我同样感谢佛蒙特大学贝利·豪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胡佛学会、普林斯顿大学西利·G·马德手稿图书馆、弗吉尼亚大学奥尔德曼图书馆、缅因大学图书馆以及联合王国丘市档案局的工作人员。

我还要感谢众多的同事们，他们的建议、帮助、乐于与他人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和对我的鼓励，对我完成这项研究同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查尔斯·布劳尔、J·加里·克利福德、贝蒂·德桑、沃伦·F·金博尔和西奥多·A·威尔逊不仅好心将他们的真知灼见，而且还将他们的相关研究笔记和出版物与我共享。1986~1992 年间，西奥多·威尔逊与沃伦·金博尔和诺尔曼·索尔一起

负责组织并邀请我参加了一系列苏美学术报告会。我最初将这项研究的部分成果整理成文、宣读与发表，正是在此期间。我非常感谢这些会议的俄方组织者 A·O·丘巴良与谢沃斯季亚诺夫以及几位美方与俄方参加者，后者的工作和友谊对我同样重要。他们是：查尔斯·亚历山大、爱德华·M·贝内特、格雷戈里·D·布莱克、戴安娜·谢弗·克莱门茨、阿瑟·芬克、劳埃德·C·加德纳、大卫·G·格兰斯、乔治·C·赫林、克莱顿·R·科普斯、伊丽莎白·麦克莱恩、史蒂文·迈纳、弗拉基米尔·波茨尼亚科夫、奥列格·勒热舍夫斯基、罗纳德·斯佩克特和 V·齐莫宁。剑桥大学克赖斯特学院的大卫·雷诺兹又锦上添花，组织了富有价值的英国学术会议，并在所有三国学者都到场的剑桥会议上极尽东道之谊。他和基勒大学的亚历克斯·丹切夫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乔治·C·马歇尔文件的编辑拉里·布兰德一直在为这一研究项目和我先前写的马歇尔传记提供帮助与资料。大卫·特拉斯克、西奥多·威尔逊和他都提出过至关重要的真知灼见，这些看法在本书有关马歇尔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地缘政治思想、珍珠港事件前后岁月的联系问题上均有所反映。本书书稿曾承蒙沃尔多·海因里希斯进行审阅，并对终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大卫·特拉斯克和兰德尔·伍茨作为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作了同样工作。迈克尔·布里格斯、基思·艾勒、沃尔特·拉夫伯、梅尔文·莱弗勒、托马斯·佩特森和佛蒙特大学历史系的不少同事，不仅提供了很好的意见，而且不断地鼓励我将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的执行编辑刘易斯·贝特曼亦是如此。在整理书稿准备出版的过程中，助理总编帕梅拉·厄普顿同样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对以上所有人员的帮助和支持，我的感激之情可谓难以言表。

然而，对我最为重要的帮助和支持，不是来自任何机构、档案保管员、历史学家或者是编辑，而是来自于我的妻子戴安娜·

加布里埃尔，因此我将这本书题献给了她。她的贡献涉及的方面最多，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也最难一一列举，不过却格外最具个人情谊和最富有意义。我希望，将本书题献给她，能够使所有这一切不言自明。

草于佛蒙特州
伯灵顿与斯塔克斯博罗

目 录

前 言	(1)
致 谢	(1)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武装部队与国家政策	(1)
关于“橙色”计划的分歧	(6)
关于英国的论争	(9)
恩比克与大陆主义方案	(13)
文官与军方的合作与冲突	(19)
“彩虹”计划	(23)
第二章 联盟战争的新战略与新政策	(29)
单独防卫西半球：短暂的意见一致	(30)
“雾虹计划”：首先打败德国的方针与英美联盟	(37)
军政关系	(44)
ABC—1 协议与“彩虹 5”计划：一种联合战略	(47)
第三章 文官和军方的分歧以及同盟国之间的分歧	(52)
混乱与冲突	(52)
对英国战略的抨击与“胜利”计划	(58)
新支点——苏联	(64)
寻求灵丹妙药	(73)

第四章	对全球战略的重新思考	(81)
	新环境	(82)
	战略选择与分歧	(85)
	远东、苏联与陆军的横渡海峡计划	(90)
	关于太平洋优先的建议	(101)
第五章	战略大论战	(107)
	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	(108)
	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英国人	(112)
	太平洋优先的现实与对苏联战败的恐惧	(116)
	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相互之间的分歧	(124)
第六章	作为对手的英国	(133)
	协调战略与政策：新的委员会机构	(134)
	对相互冲突的战略与政策的分析	(141)
	打造新的战略统一战线	(153)
第七章	谜一般的同盟国苏联	(159)
	合作政策之由来	(160)
	对抗方案	(171)
	难解之谜	(176)
	国内和国际安全计划的初期制订情况	(178)
第八章	文官与军方的合作与冲突	(189)
	军方与国务院再度交锋	(190)
	战后政策和军队复员计划	(198)
	总统的敦促，“JCS570”号文件， 以及“衣阿华”号上的谈话	(205)
第九章	两个大国	(213)
	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分水岭	(213)
	参谋长联席会议与苏美两极世界	(220)
	文官与军方在托管岛屿问题上的冲突	(227)